

# 周辅成先生与人道主义大讨论

□ 赵修义

**内容摘要** 周先生在二三十年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论说，至今发人深省。梳理周辅成先生在人道主义大讨论前后的言说，让人深受教益。老一代学人敬畏学术，事事“请循其本”，从真不从风的高尚品格，感人至深。正是依靠丰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风，留给我们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遗产。

**关键词** 周辅成 人道主义大讨论 老一代学人 请循其本

**作者** 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41）

专注于人道主义研究的雷永生先生，在完成人道主义史的编撰之后，正在着手编撰 1980 年代中国进行过的一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的实录与反思的文集，并约我写一篇反思的文章。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理应支持，但又觉得相当为难。因为我当时正受命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的课程，而且还刚刚入门，无暇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读过论战中的一些重头文章。既没有做深入的思考，也谈不上什么研究。但是自 1950 年代末期以来，看到一次又一次对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批判，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留下了一大堆疑问。而且那时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中，也逃不过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1980 年代初社会上出现的“萨特热”，在大学生中反响尤其强烈。他的名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许多学子所赞赏，他们在课堂上也往往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不能不自己去寻求解答。这个时候周辅成先生所编的《文艺复兴至 19 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一书，就成了必读的材料。看了雷永生编的目录，就生发出一个疑问。怎么会没有周先生的文章呢？按说他是 1960 年代主管当局为了批判修正主义而组织编写的两本资料集的主编之一（另一本是朱光潜先生主编的《西方文艺家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又是为数不多的为梳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演进线索，付出过许多精力的通晓中外思想史的专家，怎么会不像朱光潜先生那样发文参与讨论呢？看来周先生对于那场讨论似乎不怎么起劲。那么周先生在这场 1949 年之后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意识形态争论中，到底是没有现身，还是现身了但没有引起多大的动静？带着这个疑问，读了周辅成先生的文集，有了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写在这里供学界同仁参考。

也许周先生没有积极现身的一个原因，是他想说的已经在那本“言论集”的序言中说过了。或许他会预计争论的各方都会去查一查这本言论集。所以，要搞清他的看法还是要回到“言论集”编撰的背景和周先生撰写的序言。

—

“言论集”是高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而布置的一项任务。对于周辅成先生这样一位解放之后一直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学者，领受这样的任务是一件未曾料想到的事情。当时正在开展对修正主义的大批判。受命编撰的又是一本只供内部发行，仅供批判用的人道主义言论集，周先生的心情想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如赵越胜所录，先生曾对他说，领导交代这是“一项反对帝修反的任务”，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sup>[1]</sup>。周先生同我们的许多老师一样，在 1949 年之前是以哲学家自命的，有自己对于哲学问题的许多独特见解和探索，但是 1949 年之后，就成了被改造的对象，把他放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他尽管也写一些论文，但大都是在试用刚刚学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古代的哲学家，寻求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传统，试用阶级分析去解释历史上的哲学家，差不多从哲学家转身为哲学史家了。周先生一度曾努力倡导建立伦理学，也曾经受到领导部门的一些明白人如于光远、潘梓年的支持，开始带过一位伦理学的研究生后来又调到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但毕竟是处于边缘的位置。“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感常伴在心头。如今领受了如此重大的反对帝修反的任务，有点兴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想必也是战战兢兢，十分小心的。因为人道主义在当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包括苏联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以

及国内的修正主义的) 一个突出的表现。1960 年春天就开始对曾留学苏联的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和哲学系教授的冯定同志进行批判, 1964 年开始给他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 在报刊上公开批判。其中的一项罪状, 就是宣扬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经历过 1949 年之后连续不断的思想批判, 包括经历过 1957 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从充分被肯定到遭全面清算的历程的这位学者, 自然会觉得对入道主义的态度绝对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周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的学术态度, 相当客观地编选了这本言论集。按照当时的惯例, 此类言论集前面必须有一个序言以引导读者。然而, 周先生写的序言却一反当时流行的大批判的文风, 把用于引导读者的那篇序言写成了一个像西方近代入道主义学说史的导论似的文章。有根有据地把这段思想史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在分别叙述文艺复兴、17、18 世纪(即启蒙时期) 和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三个历史阶段入道主义的(尤其是前两个阶段) 演进时, 他用的基本的分析框架是: 把入道主义置于劳动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斗争之中, 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旧思想的对立中, 封建统治阶级一方的旧思想是以上帝为主, 属于神道主义, 人民则处于从属地位, 而入道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想则是“力争以人为主, 以人民为主”。一方面以人兽之分取代天(上帝) 人之分, 大胆地肯定自我; 另一方面则推演出一种入道主义, 把一切人的现实要求归结为人的自由与人的幸福, 竭力辩护人的幸福的要求, 并为此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论点, 还提出了宽容的主张。只是他们实现入道理想的方法还停留在要求开明专制。

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 在周先生的笔下也是新时期的新思想。它首先把人的自由幸福的要求以争取个人权利的形式提了出来, 形成了“自然权利”、“自然法”、“自然秩序”的一套理论, 以此为依据论证了人民有权推翻封建政权, 实际上提出了根本改变制度的要求, 在更加重视教育的基础上特别重视立法, 并提出了革命的口号。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入道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周先生自然也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分析其历史局限性, 尤其是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分析, 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在取得政权之后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上所显示出来的虚伪性。

对 19 世纪的人道主义所作分析, 序言沿用了恩格斯所采取的以 1848 年革命为界的做法。对 1848 年之前的人道主义, 着重批评了费尔巴哈把“博爱”看作是入道的根本内容, [2] 也就是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所说的不要把入道主义归结为仁慈主义。对于 1848 年之后的人道主义, 周先生采用了一种独特的两分法, 着力区分了大学讲坛上的人道主义同人民的实际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人道主义。讲坛

上的就是孔德、穆勒等他称之为“虚伪的人道主义”, 还有从费尔巴哈的“博爱”进一步推演到了提倡“慈悲”的叔本华和主张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之分的尼采。周先生认为后者实际上已经是反入道主义了。另一方面, 周先生提出了一个没有来得及展开的话题: 19 世纪下半期, 社会主义遍布欧洲, 而“其中的多数仍然讲新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使人道主义与实际的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密切结合在一起”。这是与讲台上的人道主义不同的另外一种入道主义。 [3]

“序言”的末尾周先生还写下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20 世纪的人性论和入道主义思想, 实际上是 19 世纪的继续。不过, 社会主义的人性论, 入道主义, 却更为壮大, 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 提出集体主义, 后来他的对手便以入道主义来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 几乎全都大讲特讲入道主义, 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 [4]。也就是说, 肯定了入道主义的诉求是 20 世纪的大趋势。

这篇序言, 正如赵越胜所评价: “在‘文革’前, 黑云压城的严峻时刻, 先生不趋时流, 不批入道主义, 而是条分缕析, 娓娓道来, 既摆明入道主义者的立场, 也引马恩语录加以对照, 表现出老一代学人中正平和, 从真不从风的高贵品格。” [5]

## 二

在 1982 年入道主义讨论的高潮中写下, 1983 年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人》一书中的“论人和人的解放”, 以及发表在《世界历史期刊》1983 年第 3 期上的“谈关于入道主义讨论中的问题”, 这两篇文章可以视为周先生在这场讨论中的现身。

前一篇文章的篇首就提到, “现在, 很多人都在直接地或者通过‘异化’间接地研究人性论和入道主义。这是令人发生兴趣的学术趋向” [6]。这句话显然是指的这场大讨论。然而从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 他避开了当时争论的焦点——马克思主义与入道主义的关系。显然他无意介入正在进行的这场意识形态意味极其强烈的争论。而且对这种矛头指向某一位代表人物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学术方面, 所以开宗明义说的话, 就是“人”、“入道”这些问题, 不是近代才有的, 更不是最近某一两个人新提出的问题, 并引用子产的“天道远, 入道弥”和古希腊智者的话“人是万事万物的准绳”作为佐证, 说明自古以来就有人道和人性问题。在西方, 古代希腊和中世纪都有人性论。可见他不是把“人性论”或“入道主义”作为一种特殊时代的思想派别来看待, 而是当作一个古已有之的学术问题和学术思潮来看待的。

后一篇文章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道主义的译名。他鲜明地表示，不赞成那种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 Humanism 不能译为人道主义，只可译为人文主义的主张，也不赞成认为启蒙时期的 Humanitarianism 和 Anthropologism，不能译为人道主义，只可译为仁慈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观点。他强调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思潮确实有注重人文科学反对以圣经为中心的意思，但是，这个理解“没有注意到这个时期前后几百年整个欧洲的社会和思想界的大变化，没有从这长时期的时代精神来估价这个新思潮”<sup>[7]</sup>。

至于费尔巴哈所用的 Anthropologism，并非其首创，康德在 Anthropology 题目下，大谈“人”、“人的品格”、“人生观”等人和人社会问题，而且康德的主张“人应该被看作目的，而不应该仅仅是手段”，这早已被大家认为是一切人道主义的根本命题或基础。由此可见，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本是一脉相承，用不着加以严格区别。周先生的结论是：“总之，我仍赞成 Humanism 一辞，通译为人道主义，而且一切历史上‘以人为本’的思潮，都可解释为人道主义思潮。”<sup>[8]</sup>

对于古已有之的人道主义，周先生是热情地加以肯定的。他强调，“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不仅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进步的，就是在远古，从它第一次诞生开始，它就是进步的思潮”<sup>[9]</sup>。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列举了古代埃及和古代希腊的例证加以说明。对于近代文艺复兴时期与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对其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的论述与《言论集》序言相仿。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大家似乎都没有想到当时并没有无产阶级，这时所谓的资产阶级和今天的资产阶级大不一样。他们多半从一般平民、甚至从劳动人民中转化而来；它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他们所处的‘低贱’的或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不能不高叫‘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打倒旧礼教’（实际对象是君主、贵族、教会）。而且，他们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有些也是永垂不朽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曾经说过，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上的成就，后人是无法超过的。”<sup>[10]</sup>

在《论人和人的解放》一文中，关于近代西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周先生还针对后来舆论界对人道主义批判中出现的一些观点，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

第一，人道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关系问题。他非常鲜明地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对于人性论写了成千上万的著作，有人指责他们的人性论都是为自私自利作辩护，这是没有根据的”<sup>[11]</sup>。他以蒲伯（A·Pope）为例，说明“这种人性论，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打垮了中世纪基督教传来的人类原罪说”，“严格讲，利他的基督教教义才是真正的性恶论、利己主义”<sup>[12]</sup>，把人看成一个天生的坏蛋。而近代的人性论“虽然肯定人难免不自私自利，但人类却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克服自私自利”<sup>[13]</sup>。此外他还

强调，“在近代资产阶级看来，人的解放就是一切诉诸人性，让天赋的权利（包括个人自由、个人尊严、个人幸福）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人性和人权受到摧残的地方，主张恢复人性，取得人权。”“应该说，这种人论在 18 世纪全欧洲，也还是起进步作用的。”<sup>[14]</sup>

第二，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从 1789 年的法国革命如何把启蒙时期的人性论的缺点凸显出来说起的。文章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说明，在这个时期的劳动人民是如何识破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和解放的假面具，看出他们的人性论的缺点的。接下来又进一步说明，劳动人民是如何逐步联合起来。首先是“公社”的组织，其次是秘密社团的作用。他引用了里斯（E Nys）教授在《近代思想》一书中的话说：“这些秘密组织社会团体的目的，在使国家从贵族与教士的压迫中得到解放，其第一步是使农民、工人从农奴状态、强迫劳动和行会中得到解放。”最后就是认识到了“财产关系的变革，乃是不可避免的”。“穷人奋起革命，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于是阶级论兴起。周先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思想以前出现的劳动人民的思想，后来经过批判、继承、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和组成的一部分。这段历史，不能被忽视，更不能被否定”<sup>[15]</sup>。这一论说是对序言的补充，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序言中未及展开来的社会主义与近代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以及其中不可割裂的历史连续性。然而此文并没有展开曾经在《言论集》中允诺的，对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史的系统梳理。

在此基础上，周先生针对过往讨论中提出的阶级论与人性论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主张从阶级论回到人性论的观点，周先生认为这只是“一家之言”。但是他又认为，“我们说阶级论不能丢，这并不意味着人性论不可以讲，的确有的时候可以大讲特讲”<sup>[16]</sup>。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于当时热议的“异化”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看来他对黑格尔使用的“异化”概念并不以为然，用了黑格尔“所谓”的“异化”这样的字眼。这可能与他依然保留 1960 年代在梳理 19 世纪的人道主义的时候，对黑格尔的学说的评价有关。在《言论集》的序言中，先生曾经提到，康德、黑格尔等德国的启蒙思想家“都是法国 1793 年所谓的‘恐怖政治’的反对者。他们一开始还称赞法国大革命”。但是在激烈的斗争一开展之后，“他们不但因此对法国革命起了反感，甚至连对自由、平等，以至于卢梭的思想，也大加反对了。其中尤其是黑格尔，甚至公开拥护普鲁士封建王朝，反对一切人道概念”<sup>[17]</sup>。

在涉及有些论者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问题时，他认为提出这一问题的人的心肠是好的，但是觉得他们举出的例证如封建特权、个人独裁、公仆变成主人等等，使自己对这种说法感到犹豫。关键在于周先生对这些现象有自己的解释。一方面他认为，这种事实恰恰表明了

“封建时代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演”<sup>[18]</sup>。另一方面则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个“维护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防止走回头路的问题”。“有人利用无产阶级之名来搞法西斯，当然是应该大声反对的；这种情况不论发生在过去或发生在现在或者发生在将来都是应该反对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不能因为有人利用劳动人民之名，我们便不为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讲话……正如民主自由甚至个人主义（译为个性主义也许更为恰当）被资产阶级利用过，我们便抛弃不用，甚至斥为反动辞语，只怕也是错了。”<sup>[19]</sup>接着这段议论，周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声明，“只是我一时的感想，不敢说是正确的意见，写出来，盼能得到高明者的指正”<sup>[20]</sup>。

时隔30年之后再读这段文字，不禁使人感到，周先生的见解确实不同于当时激辩的双方，相当独到，非常值得玩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会的演进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也颇具预见性。

至于要不要把人道主义作为今天的奋斗目标，周先生觉得，“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sup>[21]</sup>。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不是学术的问题。他非常谨慎地表示了异议，认为“我们还应当坚持‘先是社会解放，然后是个人的解放’的观点”，“有人想用旧瓶装新酒，我看，恐怕也成问题”<sup>[22]</sup>。

上面就是周辅成先生在1980年代初的大争论中发表的一些看法。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专业性比较强的《世界历史》期刊上的，另一篇没有投到任何刊物上发表，仅仅刊载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马克思主义与人》中，因而湮没在大量的类似的文集中。文章的标题用了“论人和人的解放”这几个字，也是意味深长的。后来他还用这几个字作为他自己的一本文集的书名。为人谨慎的周先生的用意究竟何在？值得我们细心体味。

### 三

在大争论经由官方作出结论之后，周先生对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问题还在继续思考，留下的文字中相关的论说，也许可以为我们解读1980年代那两篇文章背后的意蕴。

最集中讨论与人道主义相关的问题有两篇，一篇是1993年为《人学大辞典》一书所作的序言——“关于西方的‘人学’、‘人论’的看法”。另一篇是刊登于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自由交谈》（第二集）中的“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答客问”。

当年大张旗鼓地批判人道主义之后，却兴起了一股“人学”热，以至于有人出来编《人学大辞典》。这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奇事。据我的记忆，首倡者是几位在人道主义大讨论中，首先向周扬等发难的人士。他们得到官方

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俨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令人不解的是，在平息了人道主义的争论之后，他们却转身成为人学的倡导者，组建了人学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并且得到了大力支持，其研究的重点大概就是批判西方的人学和人论。周先生的这篇序言大概就是这个背景下，写出来的。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人学”到底起始于何时？这是一个思想史上的事实问题。谙熟中外思想史尤其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周先生，观察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开始，卷起风起云涌的大谈文化的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又以存在主义的著作开始大谈‘人论’、‘人学’，其著作铺天盖地。不仅在西方如此，在东方，在日本、中国、印度亦均急起穷追”<sup>[23]</sup>。

接下来周先生用思想史的事实来加以佐证。论述的基本脉络如下：先说明文化问题和人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在这两方面中，人是什么却是第一个重要问题”<sup>[24]</sup>。进而梳理了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演进。指出人类对“自己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在埃及人那里已经有了。希腊人算是非常重视“人”或“人的研究”，创造了普罗米修斯这样理想的人的典型。但是，哲学家总是要在人论之上，加上宇宙论、知识论。所以，“形而上学或知识论，才是哲学根本问题”<sup>[25]</sup>。中世纪注重的是“上帝之学”，也特别注意本体和宇宙，是“天学压倒了人学”。近代之初曾经有过把人当作哲学的主题，出现了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之名。但是由于重视自然科学，结果是“物学”压倒了“人学”。康德将压在人学头上的天学即形而上学划为不可知的东西，存而不论。对人的智、情、意、信分别做了分析，但是讲到总体的“人”的时候，却苍白干枯。对于黑格尔，文章一方面对其《精神现象学》用“精神”来综合地讲“整体的人”，予以肯定，说这“提高了人的创造性才能与人格地位”。另一方面指出，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开启了对黑格尔的误解，似乎他不重视人，只重视国家集体。接下来文章着重指出：“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法西斯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至上’的口号下，死了千千万万的无辜的人！新的文化论，新的‘人’论就是在对这大悲剧感到悲愤下发生的。新的‘人’论作者，不少是亲自参加过、亲自看到过反法西斯战争的。”<sup>[26]</sup>

基于这一历史背景的分析，周先生对于新的人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新的人论、人学，是为‘人’争独立人格、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理论；也是想要为‘人’作一个综合的、完整的探讨的壮举，要让人明白，‘人’是我们思想中最根本的问题，过去对于人的研究还不够，对人的重视和尊重还不够。所以，要为‘人’而大叫大嚷。”<sup>[27]</sup>

文章的末尾提出了对待西方人论的态度问题。周先生提出的口号是，“第一，是研究；第二，还是研究；第三，才是批判”。他还强调在缺乏研究的条件下，“我们对他们的批判过多，未必有好处”。“以政治态度论，他们不是凶恶的法西斯暴徒。我们还怕对他们的批判过度或不恰当，将会变成替法西斯讲话，因为他们的话，主要是为了反对法西斯理论。希特勒党的全名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法西斯’一词原义，乃是‘社团’、‘集体’。”<sup>[28]</sup>

关于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关系的短文，写于1996年。文章是用“请循其本”的概念史的考证方法切入主题的。首先考证的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指出在14到16世纪出现的势不可挡的平民反对专制的潮流中，民间的先进人士不重天道而重人道，或是从事宗教改革，强调“天国或上帝，就在人的心中”。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是这场运动，最初并不曾标明是人道主义(Humanism)。直到后期意大利人才用“人道主义”一词来专指这场反对专制的潮流。周先生还强调，“现在有人把它解释成18、19世纪欧洲基督教保守派如沙夫慈伯利(Shaftesbury)等提倡的仁慈主义(Humanitarianism或译为慈善主义)，抹煞其进步性，从而予以攻击，这是不正确的”<sup>[29]</sup>。

关于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文章的考证指出，在启蒙时代，卢梭等核心人物，“除了宣布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之外，并未自称自己是什么主义”。“无人用个人主义一辞。”<sup>[30]</sup>首先采用这个词语的是法国的托克维尔。他出于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暴民”和罗伯斯庇尔的仇视态度，“于是采用拉丁文 Individualis 或 Individuum (=in+dividuum ‘原子’，拉丁文原无贬义) 加上 ism (主义)，来形容英国、法国大革命中的平民（即第三等级）的行动与理论，从而把启蒙运动也看做是个人主义思潮，但不是尊重它，似乎是贬抑它”<sup>[31]</sup>。托克维尔指责个人主义会弃绝社会、削弱公德，最后会沉沦为纯粹的利己主义。由于这一见解适应了19世纪上半期欧洲大陆广大的复辟派的心态因而大为流行。总之，就个人主义这一词语的起源来说，乃是反对法国革命的保守派用于贬抑革命中的平民时所用。

当然，一旦流行之后，立即就有两种或多种的解释与派别。即使在保守派思想家中也有人（如卡莱尔、爱默生等）在正面、积极良好的意义上采用这个词语。周先生强调指出，“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或唯我主义者(Egoist)是自私自利的主张者”<sup>[32]</sup>。

那么自19世纪后半期流传至今的个人主义主要的主张是什么呢？周先生认为，“多半明白主张‘整体依个体而得到理解’‘一切社会生活方式，都是其中的个人所创造，都只能被视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sup>[33]</sup>。由于个人和国家、集体总是掺混难分，所以就需看具体的情况。“从历史事实看，在一个平民比较有民主自由的社会中，

若有人去讲集体主义，权威主义，一定是不合时宜的，不会有几个人附和；反之若有人生活在国家至上、领袖至上的集权统治下，却去讲个人主义，一定会自讨没趣，甚至被视为‘大逆不道’和‘犯罪’的危险。”所以，看待个人主义要做具体分析，“首先要看它是针对何者而言”，也就是说要看他所处的具体条件。历史上，“有贵族的、保守的个人主义；也有平民的、革命的个人主义。二者的意义可能完全相反。我们万万不可望文生义，随意加以评判”<sup>[34]</sup>。

在1998年发表此文的时候周先生又加了一段附言，对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做法提出批评，指出“有人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辞的关系，解释成‘私’与‘公’的关系，恐怕欠妥当”<sup>[35]</sup>。其论证还是采用概念史的方法。用历史事实说明，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是作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相对立的词语出现的。双方争论的是经济问题即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争论是当权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争论。所以，“集体主义”一词“与社会上从平民或者是工人间流传的社会主义思潮，并无直接关系”<sup>[36]</sup>。他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到过集体主义，更没有说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就是集体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要用集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恐怕只能算是某个人的意见，或在某个时期，某个场合的意见。但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意见，更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sup>[37]</sup>。

这两篇晚年的文章，言简意赅，振聋发聩，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周先生在1980年代那场大争论中现身时所发表的言论的深意。从中也可窥见屡屡遭受批判的老一代学人，在这场意识形态的大争论中的真实心态。

周先生在二三十年前的这些论说，至今发人深省。梳理周辅成先生在人道主义大讨论前后的言说，使人深受教益。老一代学人敬畏学术，事事“请循其本”，从真不从风的高尚品格，感人至深。正是他们依靠丰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风，才留给我们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遗产。

#### 参考文献：

- [1][5] 赵越胜.问道者——周辅成文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33-134、134。  
 [2][3][4][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 周辅成文集(卷I).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2、74、76、106、155、156-157、157、158、107、108、108、109、117、120、71、155、120、121、158、159、368、368、369、370、371、371、469、470、470-471、472、472、472、473、473、474。

编辑 叶祝弟